

Reader

培文读本丛书

激进哲学

阿兰·巴丢读本

陈永国 主编



Radical Philosophy:

An Alain Badiou Read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Radical Philosophy:
An Alain Badiou Reader

激进哲学
阿兰·巴丢读本

陈永国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进哲学: 阿兰·巴丢读本 / 陈永国主编.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

(培文读本丛书)

ISBN 978-7-301-15997-2

I. 激… II. 陈… III. 巴丢, A. — 哲学思想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7745号

书 名: 激进哲学: 阿兰·巴丢读本

著作责任者: 陈永国 主编

丛书策划: 高秀芹 于海冰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997-2/B·083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22.5印张 380千字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代 序

一种新的主体哲学^[1]

彼得·霍尔沃德

巴丢关于事件的哲学本身无疑是近来法国哲学的重大事件之一。对毫无意义但又不可避免的“当代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这个头衔来说，巴丢也许是唯一能与德勒兹和德里达相竞争的对手，他的论文《存在与事件》(*L'Être et l'événement*, 1988)当然也是法国自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1960)以来最宏大最咄咄逼人的一部哲学著作。此外，非常恰当的是，他的著作目前对英语读者还相当新，因为巴丢的整个哲学还仍然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创新。他的著作详尽地探讨了相对较小的一组本质问题：全新的东西是怎样进入世界的？什么样的创新才要求和值得进行全面普遍的证实？面对世界明显的冷淡或抵抗，这种创新的结果如何才能持续下来？能够证实这些结果的人如何才能继续他们的证实？

虽然巴丢本人在漫长而不平凡的生涯中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抵制，但是，他今天在法国哲学中占据了一个尽管有争议但突出的位置。多年来，作为樊尚/圣德尼的巴黎第八大学的教授，他于1999年被任命为法国高师哲学系主任。他在国际哲学学院的公开讲座吸引了数百名听众。20世纪70年代，他是一位忠诚的毛主义者，在激进的政治中保留了一个自信的声音，并且直接参与了一些关于移民、劳工问题和最广义上的政治正义的运动。除了十几部哲学著作外，他还发表了一些小说和剧作，探讨了当代数学界争论得最激烈的几个数学概念。巴丢是不能用传统的方法加以分类的。他的著作涉及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领域——数论，精神分析学，现代诗歌，政治理论，戏剧和表演理论。他以不同方式忠实于康托尔(Cantor)、科恩、拉康、马

[1] Peter Hallward, *Intruduction to Badiou: A Subject to Trut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拉美和列宁。尤其特殊的是，也许任何其他当代法国哲学家都无法相比的是，他表明了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任何清晰划分都是过时的。虽然对数理逻辑持批判态度，但他仍以数学为前导。他对弗莱杰 (Frege)、维特根斯坦和哥德尔就像他对黑格尔、尼采和德勒兹一样熟悉。他的哲学观拒绝“分析”和“欧陆”这两个修饰语，就如同他拒绝把哲学区分为相对独立的（政治的、美学的、认识论的）领域一样。

如果巴丢的著作仍有待于赢得比较知名的同代人的承认，^[2] 这大多是因为它顽强地抵抗法国和英美的每一种主导哲学倾向。巴丢如果不是论战者就什么都不是，他所抨击的目标多种多样。他拒绝接受尼采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的说法，不认为高深地运用普通语言就能解决哲学的空洞乏义的问题，也不认为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是极权主义的先驱，或奥斯维辛事件要求对哲学加以彻底的改造，或斯大林强迫我们回到共和议会制，或文化人类学必须取代概念的普世主义，或承认应该以“最好的效益”取代原则的描述，或牺牲哲学而建立一种完全他者的伦理学。他的本体论打破了整个新黑格尔哲学的遗产，从列维纳斯和德里达到南茜和拉库－拉巴斯。他断言绝对的本体多元性排斥任何隐蔽的对存在的统一性（德勒兹）或超越存在的一（拉德罗，詹贝）的神学依靠。他对柏拉图的审慎忠诚是对现代诡辩论（尼采，维特根斯坦，利奥塔）的挑战。尽管忠实于启蒙运动好战的无神论，但他独特的后拉康式现实主义却在原则上拒绝各种形式的实用主义。巴丢从未接受许多前马克思

[2] 在最近对 20 世纪法国哲学进行的最彻底的两次英语调查中，巴丢的名字甚至没有提到 (Eric Matthews, *Twentieth Century French Philosophy* [1996]; Gary Gutting, *French 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001]，而包括 1998 年在内的 *Philosopher's Index* 没有收入与巴丢有关的文章——关于德勒兹的有 106 篇，关于福柯的有 656 篇。除了我的“普遍主权” (1998) 外，齐泽克的“后马克思主义中的精神分析学：阿兰·巴丢” (1998) 是最初深入探讨巴丢哲学的英语文章；较长的版本收入他最近出版的《棘手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缺场中心》 (1999) 中。齐泽克的著作与巴丢的著作大有可比之处。让－雅克·勒塞克的文章（“康托尔，拉康，毛，贝卡特，同一场战斗：阿兰·巴丢的哲学” [1999]）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概述。见巴丢著作的英译目录。也许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是，巴丢的哲学在拉丁美洲发生了最大的影响。除了正在发表的英译本和原文外，阿根廷的杂志 *Acontecimiento* 10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探讨巴丢的政治思想，并联系到各相迥异的运动，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Madres de Plaza de Mayo* 和 *Chiapas* 的 *Zapatistas*。Bruno Bosteels 即出的著作（暂定名是《巴丢与政治》）将把这方面的资料提供给英语读者。《再思想：阿兰·巴丢与哲学的未来》 (Peter Hallward 编辑) 收集了研究巴丢著作的一些批评文章，作者包括 Ernesto Laclau, Alenka Zupančič, Jean-Luc Nancy, Etienne Balibar, Jacques Rancière, Jean-Toussaint Desanti, Daniel Bensaïd 等人。

主义知识分子所宽容的“激进普世主义的黎明”^[3]，但他关于普遍性的单一概念使他脱离了康德和超验的传统。他对社区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敌意甚至超过了对仅仅讲究规程的正义或道德观的蔑视。他恪守真理的普遍性，这使他站在了科学和理性主义传统的一边，站在了各种形式语言学或相对主义转向的对立面，但他的主体概念标志着对阿尔都塞已经成为传统的经验主义科学观的突破。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巴丢的著作最强烈地谴责了20世纪70年代末在法国哲学和英美文化批评中出现的推崇差异(文化、性、道德、政治等)的一种伦理学。这里，巴丢的攻击目标，尽管很少有人提及，但却是人们习惯上所说的新哲学，而论点却常常与各相迥异的立场形成对峙，如列维纳斯和罗尔斯，以及北美的“文化研究”^[4]。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巴丢的著作在今天几乎不能根据英美学界盛行的原则来阅读——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哲学的。巴丢毫不犹豫地接受、有时藐视由此而导致的边缘化：“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始终是对观念的突破。……对哲学家来说，凡是没有争议的东西就都是可怀疑的。”(AM, 90)

巴丢哲学基本的和一鸣惊人的举措，使他完全脱离同代人的举措，就是证实真理的严格的、毫不妥协的普遍性，并最终把这种真理从判断和阐释的合法性中抽取出来。巴丢的最基本前提也许是，不管“真理”是别的什么，只有通过决定性地打破判断(或阐释)意见(或理解)之合理性(或多产)的既定标准，才能接近真理。这个前提有两个重要含义。一方面，如果当我们谈论某一环境的真理时，这个真理所关怀的不是其最清晰可辨的独特因素，而是最难辨别的或“被捉摸不定地包括进来的”因素的集(EE, 313)。一个环境的真理总是关怀关于那个环境的最模糊或“普遍”的东西。另一方面，把这些集组装起来的过程本身就违反了把这些因素组合起来的一切惯常方式。真实的或普遍的集必须是打破现状的东西。

巴丢的整个哲学概念是由“一个简单而有力的思想激发的，即任何存在总有一天要被发生在它身上的东西所改造，并从此致力于普遍的东西”(SP, 70)。这个概念恪守拉康的严肃规定：“重要的不是理解，而是获得真理。”^[5]在这方面，巴丢是一

[3]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er, *The Grandeur and Twilight of Radical Universalism* (1991).

[4] 巴丢所说的普遍真理在定义上是非文化的：“相同性中的相同者不必有教养。”(C, 250; cf. SP.117, E, 27)

[5] S3, 59/48; cf. 163/143.

长串介入思想家的不合时宜的后代，他们的主要洞见就是：只有反对世界的精华，反对现行的历史，才能接近真理。这些思想家中有圣保罗、帕斯卡尔和克洛岱尔（对他们来说，“众生之路不是走向上帝的”^[6]），有笛卡儿、康托尔和希尔伯特（对他们来说，感性的直觉永远不能提供坚实的知识基础），自不必说有列宁、卢卡奇和布勒东了（对他们来说，纯粹客观的历史倾向从来不能真正打破过去的惰性）。在每一种情况下，真正决定性的时刻——就上帝的存在所下的“无可辩解的”赌注，对“难以定义的”数理公式所做的形式分析，对政治或美学革命许下的“无法证实的”诺言——都具有突如其来的发明性。这样的决定不是建立在任何基础之上的。任何事物——知识，对规则的熟练掌握，“游戏的感觉”，对场所或传统的理解——都不允许从“事物的本来状态”或对事物本来状态的任何操作（理性化，澄清概念，外推，夸张，变体，派生等）中演绎出这样的决定。每一个这样的决定都是以原则地打破事物的本来状态开始的。然而，坚持这一观点的后果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对世界或直觉或历史进行彻底的评价。

今天，最特别的东西莫过于一种真正的发明，而反对纯粹怀旧地忠实于对真理的一种厚颜无耻的党派式理解。除去明显的差异不谈，20世纪哲学的三大主流——源自逻辑实证主义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产生于狄尔赛、海德格尔和迦达默尔的解释学，以及德里达和利奥塔发展的后结构主义——的共同之处，除了都把语言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媒介外，还对真理一词报以深切的怀疑。现代哲学欢迎一种普遍的诡辩论。作为回应，巴丢的著作代表了当代向古代传统回归的一次重大尝试，也即把哲学与对清晰和不确定的见解和意义的划分相联系的传统。所谓“当代”，我是说巴丢的真理哲学不过是向柏拉图或笛卡儿的真理规程的一次回归。如我们将看到的，巴丢的哲学恰恰是以标志着我们时代特点的特殊真理为条件的。

那么，巴丢所说的真理（vérité）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如巴丢所认为的，所要掌握的主要问题是，一个真理是（不时）发生的东西。如马克思一样，巴丢懂得“人类思想是否达到客观真理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真正的思想与其说是理解世界，毋宁说是改造世界。^[7] 一个真理是我们制造的东西。它是它所召集和维持的主体所宣布、构造和坚持的东西。真理和主体都是偶然的、特殊的。它们一旦出现，就一起出现，在量上有别于作为其对立范畴的知识和客体。

[6] Cf. EE, 245; LS, 136–137 n.15.

[7] Karl Marx, *Second Thesis on Feuerbach*, in *Early Writings*, p. 422.

这种区别贯穿于巴丢的整个事业。一方面，有一个永久的领域，包括客观具体的知识，肯定的同一性或差异，清楚确定的利益——这是在秩序内部的一个秩序和空间的领域。另一方面，时不时地要出现一些没有秩序或连续性的、完全独特的、严格的主观真理（以复数形式出现）。这些真理通过从已知的特殊性中抽身出来而逃避了第一个客观领域的具体行为。巴丢的真理哲学断言有一种没有客观性的严格的逻辑。他断言，在每一种情况下，“真实的东西（或正义的东西——碰巧它们是相同的）不可能回指任何客观的集，无论是作为原因还是作为目的”^[8]。可以说，巴丢的著作把“尝试过的和真实的”这两个熟悉而相互关联的形容词分裂开来。每一个真理都把主体推入未经尝试的领域，而由于那个原因，主体经受了“考验”。或者说：每一个主体都“在不知道原因的情况下相信某事”（TA, 9.1.97）。

真理物质地生产于特定的环境之中，每一个真理都开始于逃避构造和控制这些环境的现行逻辑的一个事件或发现。巴丢赞成拉康的说法：“接近真实的一切途径都是关于一次相遇的秩序。”^[9]作为规则，每一个“独特的真理都根源于一次事件。某事必须发生，这样才能有新的事物。甚至在我们的个人生活里，也必须有一次相遇，必然有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不可预见或难以控制的事情发生，必然有仅仅是偶然的突破”。^[10]这样一种相遇或事件没有客观的或可证实的内容；它发生在一种环境中但却不“属于”那个环境。那么，一个真理就仅仅通过一些人激进的宣言而持存下来，这些人忠实于一个不确定的事件，肯定这个事件的发生和结果，换言之，这些人以那个事件为名而成为了主体。尽管任何个人都可以成为主体，但纯粹的个人生存一般都陷入了对某种客观生活的维持之中。但这种客观生活可以通过与某事的相遇而被打破，因为这个某事并不符合主导的再现领域——如纯粹的惊奇，某种危机，个人难以反应的事件（他或她不能轻易再现的事件）。面对这样的事件，个人完全可能否认或压制它：但任何人都可能把对日常事件的这种搁置用作发明新事物的机会。

[8] SP, 6. 巴丢固守拉康的原则：“除了通过丧失客体的中介，人不会取得什么成果。”（S2, 165/136）

[9] E, 47. 作为虚空的暴露，一个事件大体上与拉康所说的“丰硕时刻”相同，即当“非融入的、被压制的、被压抑的东西隐约出现时焦虑的爆发（S1, 292/188），打破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幻觉，促成了真理的艰难表达：“这个象征过程的结束就是非存在 [也就是说，环境的真空] 到来之时，因为它已经说话了。”（S2, 354/308）

[10] Alain Badiou,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p. 124. 如德勒兹所说，“世界上有些东西迫使我们思考。这个东西不是要识别的客体，而是一次根本相遇”（Gilles Deleuze, *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 p. 182/139）。

在巴丢看来，如果这种被看做新的行为标准的发明与某一正当的普遍原则相一致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它是每一个人在原则上都可以认同的一种发明的话，那么，个人就变成了主体。只有这样的一个原则才能成为一个新序列的真理。

因此，真理首先是信仰的问题，每一个主体都表明了“此时、此地、永远的信仰”（SP，31）。按照巴丢的用法，“真理”一词的内涵意义非常接近英语的“真诚”或“忠诚”。巴丢所说的主观化本质上描写与某一事业认同的经验，确切说，是皈依或献身于某一事业的积极经验——人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认同的一项事业。他写道：“你要么参与，宣布这个首创事件，承担后果，要么置身于外。这个没有媒介或中介的区别完全是主观的。”（SP 22）主体的身份完全无条件地取决于这种承诺。我在，因为我在（或我们在）斗争（为一个新社会，一种新艺术，一种新的科学秩序，等等）。巴丢指出，只有在这种罕见的纯粹献身的时刻，我们才成为我们所能成为的人，就是说，我们被带到正常的界限之外，超过了可预见的反应范围。只有在这个不可预见的领域内，在这个纯粹行为的领域内，一个人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主体而非客体。弗朗茨·法农对无法克服的军事解殖过程的深刻论述充分说明了巴丢所想到的那种献身：在分裂和压制性政权所强加的束缚之下，“解殖把受压制的无足轻重的旁观者改造成了特殊的行动者，把历史的泛光灯耀眼的光芒照在他们身上”。至于每一个真理的规程，这种“解殖可以证实是新民族的创造”^[11]。

真理、主体和事件是单一过程的各个方面：一个真理通过宣布真理的主体而得以存在，这些主体在宣布真理的过程中以其对事件的忠诚而成为了主体。如齐泽克所说，“我们通向真理的路与真理本身相偶合”^[12]。共同的忠诚是一个主体社会或集体的基础，除了忠诚之外没有其他标准。这样一种真理始终是单一的，这意味着“社会或历史上既定的东西都不能赋予其过程以内容”，任何“可用的概括都不能说明它，也不能构造维护它的主体”。被剥夺了既定位置之后，真理就是开放的了，就“提供给所有人”了（SP，15）。换言之，任何单一的真理都必然是普通的或难以识别的、平常的、彻底平均主义的同质性的东西。

巴丢自己的例子以典型的多样语域把圣保罗的好战概念包括进来，即作为使徒的主体只能通过宣布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事件（耶稣的复活）而存在，但这个事件没有积极的或既定的意义；雅各宾党和布尔什维克党对一次革命事件的忠诚，就其

[11] Frantz Fanon,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66/36.

[12] Slavoj Žiž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64.

主体力量和普遍规模而言，超过了促使其发生的那些特殊行动；一对恋人把自己看成是相爱的主体，其基础只是对他们相遇的这个昙花一现的事件的忠诚；艺术或科学则忠诚于由于发现或突破传统而打开的一条创造性的探究路线。更多的政治例子，包括巴勒斯坦的 Intifada，1988 年缅甸的学生运动，以及最近墨西哥的 Chiapas 叛乱和巴西的 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用最主观的术语说，每一个序列都成功地调动了几十年来始终处于最淹没状态的那些人，在各自环境中最无法再现的人。

出于有待澄清的一些原因，巴丢列出了四种真理模式：“革命、激情、发明和创造”，它们和真理的四个领域相对应——政治、爱、科学和艺术（D，97）。在每一个领域里，主体都是真理的主体，它本身既是单一的（就时机和原创性而言）又是普遍的（就规模而言）。哲学本身并不生产这种意义上的真理。相反，它寻求把这四个领域里的当代产品辨认和聚合起来，如果存在的话，认其为“时代的真理”。这种真理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永恒的东西。

因此，这四种真理模式为哲学提供了“条件”——哲学便由此产生。哲学总是以外在于它的思想的事件为条件。在这些条件之外或“类属规程”之外，所盛行的只有巴丢诊断为我们当代之卑鄙的东西：对既定差异和区别的监督，遗传特权和偏见的主宰，多产的身份主张，它们只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协调，只能用一剂消极的伦理束缚来证实，这都是根据人权或人道主义义务的术语来表述的。^[13]这就是在日常运作中“敌视哲学”的一个世界的本质（DP，8—9）——由具体利益、相对判断和深思熟虑构成的一个世界。对巴丢以及对帕斯卡尔或克洛岱尔来说，每一个主体和真理的每一次生命之所以都冒着突破现实世界、结束日常生活的危险，其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巴丢所恢复的主体范畴要严格区别于近来回归主体的倾向。他的主体是坚决反规范、反道德的。“空洞的，分裂的，无实质的，无思想的”，巴丢的主体恰与阿尔都塞和福柯宣布的“人之死”相一致。^[14]真正的主体化无视社会认可的立法或集体标准。无法逃避的是，对真理的每一次证实“都只能被看做是对主体的非道德化”（TA，6.11.96）。巴丢的主体是非社会的，非文化的，也是坚决反心理学的。它绝不是自觉经验的培养，在某种意义上，其基础始终是无意识的，或至少是意识之外的。

[13] Alain Badiou, “L’Impératif de la negation,” 9.

[14] EE, 9; E, 10; cf. TS, 203–204.

严格说来，“不可能有主体的经验”^[15]。真理的主体与其说是（新笛卡儿哲学的）反映功能，毋宁说是（新黑格尔哲学的）否定或总体化。^[16]最重要的是，它无视后萨特时代复活的主体中普遍存在的那种错综复杂的自我延宕和自我间离，这样一个主体是通过差异和他者范畴的中介而得以存在的——也就是梅洛-庞蒂、伊瑞格蕾和利科所探讨的“作为他者的自我”的观点。在巴丢的后拉康意义上，分裂主体的真理同时把这个主体从所有纯粹文本的或象征的延宕中抽取出来。巴丢的主体既是自治的，同时又是德里达和巴巴所解构的，但这是因为他们逃脱了延异的逻辑，从所有“神秘的”内部撤离出来，^[17]以至于完全存在于它们所证实的当下的外部之中。由于只凭借对自己发明的信心，巴丢的主体从根本上说是没有他者的，没有对立面的。

不管表现多么不同，但正是这种广泛分享的承诺，对“没有对立面的”主体（MP，74），对没有特殊性的单一性的承诺，巴丢才期待着“一方面对拉康、萨特和我自己，另一方面对海德格尔和德勒兹和利奥塔的某些方面……加以重新组合——对过去30年来的哲学进行某种出乎意料的形式上的重新组合”^[18]。巴丢自己的“类属”单一性的哲学也许是对这个正在出现的集的最有争议的、最严格的，当然也是最具创造性的贡献。它以最严格的方式把一种关于事件的非凡的哲学与无法识别的或没有特殊性的一种哲学关联起来；这是在柏拉图的相同者符号下探讨非凡事物的哲学。这一关联使巴丢把理性从实证主义中拯救出来，把主体从解构主义中拯救出来，把存在从海德格尔手中拯救出来，把无限从神学中拯救出来，把事件从德勒兹手中拯救出来，把革命从斯大林手中拯救出来，把对国家的批判从福柯手中拯救出来，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把对爱的肯定从美国的大众文化中拯救出来。他宣布不依靠现象学的一种主体的哲学，不依靠充足性的一种真理的哲学，不依靠历史主义的一种事件的哲学。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事业。巴丢成熟的著作提供了迄今最有力的用以取代形形色色的仍然统治人文学科的后现代主义的选择，同时对刚刚作为反弹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前—后现代主义”毫不妥协。

[15] TA, 6.11.96. 如以往一样，“心理学是思想的敌人”（Alain Badiou, “Saisissement, dessaisie, fidélité,” 14）。

[16] “今天我们关心的主体不可能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总体化的思想是不切实际的”（Alain Badiou, *Jean-Paul Satre*, 8）。

[17] 试与德里达比较，*Donner la mort: L'Éthique du don, Jacques Derrida et la pensée du don*, 67/67; 101–102/108–109。

[18] Alain Badiou, “L'Entretien de Bruxelles,” 23。

巴丢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类属”(the generic)。一个普遍真理在它所处的环境内部仍然是无法识别的或无法辨认的。一旦从差异的监督和区别的监督中扣除出来,一个普遍真理的构成就以悖逆当代主流的方式证实“同一性对他者的优势,对作为分类原则的差异的拒绝(因为普遍性是几乎被还原为无的差异,也就是同一个环境或表征的存在)。一个真理就是同一性的徘徊。”^[19]

根据巴丢,我们时代的重大事件恰恰例示了最具原创性地探讨了现实的类属概念的那些思想,无论是政治的、数学的、科学的还是爱的思想。这些创造决定了真正属于当代的一种哲学的条件:

普遍性是柏拉图思想转向多样性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哲学与当代条件相共存的基础。关于今天的创造性政治,如果存在的话,我们至少知道,自1793年以来,这种政治只能是平等主义的,反国家的;它们通过历史积累的层次和社会的不透明性追溯人类的普遍性和层次的解构,区别性或等级制再现的废墟,由单一性构成的一种共产主义的假设。关于诗歌,我们知道它探讨一种未分化的、提供给所有人的、非工具性的语言,即建立语言自身普遍性的一种语言应用。关于数学,我们知道它掌握了被剥夺了一切可呈现的差别的多,即多元存在的普遍性。最后,关于爱,我们知道在相遇之后,它宣布忠实于它所建立的纯粹的二,它制造了关于男人与女人之间差异的一个普遍真理。(MP, 91—92)

最特别的是,巴丢发展了下列事件的结果:在数学界,是从康托尔到科恩的集合论的形式化;在政治领域,是开始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法国1968年5月的一系列民众起义;在诗歌领域,是马拉美、佩索亚(Pessoa)和塞兰;在爱情和欲望方面,是拉康的典范之作。^[20]巴丢的著作就是要努力确立这些事件的共存。

在探讨标志着20世纪特点的真理的一部近著中,巴丢认为这些和其他同样普遍的宣言所具有的共性就是“对真实的激情”和他们对纯粹形式化的资源的信赖,把这些资源作为充分表达这种激情的唯一媒介。如巴丢所理解的,用拉康的术语说,真实(the real)不过是与这种普遍性的一种主动相遇。完全被“当时的迷恋冲昏了头脑”,经历了当时当地的疯狂的紧迫性,对理想期待的许诺无动于衷,无法做出任

[19] Alain Badiou, “Dix-neuf réponses à beaucoup plus d’objections,” p. 263.

[20] MP, 60–69; cf. Alain Badiou, *Une Soirée philosophique*, pp. 22–23.

何道德判断，从每一个特殊的踪迹中抽取出来，这些都是与真实的一种激情相遇所产生的结果，它们只能通过发明一些形式手段才能保存下来，而毫不隐讳地说，这些形式手段没有留下任何谈判或阐释的余地。我们可以说，巴丢的伟大成就就是为我们的时代在概念上重新阐释了真实（直接的行动或宣言）与理想（形式的一致性）之间的关系，后者是作为前者的结果而在时间中构造的。普遍的形式化直接呈现自身，以至于阻碍可能的再现：通过纯粹的形式化而直接接触得到的东西是不能用其他方法获得的。普遍只能被界定为对任何“特殊”意义的拒绝，这就是说拒绝任何单一的意义。最能体现欧洲之雄心壮志的世纪里的一切伟大创举——从希尔伯特（Hilbert）到布尔巴基（Bourbaki）的数学程序的形式化；从列宁到毛把党的纪律当作独一无二的政治形式的阐发；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的对性进行彻底的形式的或反阐释学的分析；从马拉美、勋伯格和毕加索到贝克特、韦伯恩和波洛克的脱离内容或意义局限的艺术形式的发明——所有这些创举的最终目的都试图开创透明的自我调节的思想形式，而在缺乏它们可能阐释或再现的客体的情况下，这些思想形式的唯一机会就是与这种真实的普遍裸露相遇。对比之下，要再现“真实”的每一个主张，以及对语义深度、社会复杂性或物质本质的每一次指涉，都只能是请人参与对意义、意见和印象的阐释和质询。与在他以前的阿尔都塞和拉康一样，巴丢把这种意义上的现实与纯粹朴素的意识形态等同起来了。由于它始终是“阻碍揭示真实的现实”（LS, 53），那么，任何普遍思想实践的首要任务就是“抽取”任何可以被当作现实的东西，以便为真实的形式化扫清道路。

如大家所知，这在 20 世纪接近尾声时变得尤其困难，这恰恰是由于反感与真实的每一次相遇而组织起激进反抗的一个时代，由于愿意接受“客观现实”、把令人沮丧的放任自由主义作为座右铭而著称的一个时代。仅就有效地致力于这个无思想的指称，也即我们这个革命时代的基本赌注而言，普遍思想必须更新。它必须证实“真实的单义性对相像的含混性的优势”，从而把古代对阐释加以形式化的斗争再进一步，以此，理念不可改变的清晰与现象含混的不确定性，事件的闪光与传统的惰性，造反的操守与接受的温顺——每一种情况都是与生存的意义相对立的一种“不朽的强度”。

如是界定，类属性便与某种“纯洁性”划等号了。类属性是通过对特殊的或详细说明的东西加以“纯化”而获得的，是要抽空一切相对或特殊的东西。实际上，

类属性本身不具有任何关系性。为了与这个革命世纪最深刻的信念之一保持一致，巴丢时刻不忘证实“关系的终结，不相关的事物自身的缺席”（LS，75）。

关系（lien）是巴丢常常用指类属关系的一个词：它的内涵意义指一种联结或联系的物质局限性，就如同更灵活的群落或关联的动力学。仅就巴丢而言，二者都是同一种欺骗的征候。真实的东西本质上是不相关的或独立的，是自我构成和自我调节的，而“联系 [lien] 或关系 [rapport] 的想法是谬误。一个真理是被解开关联的 [déliée]，而真理的过程正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解开关联的局部的点”（PM，56）。真理不过是摆脱一切关系的一种自由的局部生产，激进的自治或自我决定的固定地点的生产。仅就其主体而言，向真理的靠近就是纯粹朴素的自由的实践。普通的人受到等级制、义务、敬服等关系的束缚和准许；他们的存在受到社会地点的局限。对比之下，真正的主体首先是不受关系束缚的，只在乎自我肯定的操守。纯主体的自由只能建立在关系缺场的基础上，这就是说建立在无的基础上。简言之，纯粹的自由总是冒着接近黑格尔所说的“绝对自由”的危险。^[21]

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把巴丢继承的哲学遗产中的两个最重要概念联系起来：萨特的激进的作为无的主观自由，作为客观的无或虚无的主观自由，就是说，一种自由决定它在每一时刻的存在，是一种持续的“从无的创造”（creation ex nihilo）；^[22]和马克思的关于无产阶级一无所有的观点，他们所失去的只有枷锁。从萨特那里，巴丢保留了主体自由在没有任何客观支持或社会许可的情况下有效地从无中创造自身的观点。从马克思那里，巴丢保留了主体充分地介入一个过程——即资本主义过程的观点，这股介入的力量可以终结一切“封建的、父权的和田园的”关系，继而“超越资本纯粹的否定力量”而对“一种没有关系的秩序，一种毫无关联的集体力量”加以形式化的介入。如对于马克思一样，这股力量不外乎是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从绝对贫穷恢复绝对平等的人类“创造力”（LS，75；cf.EE，425）。简单说，巴丢把萨特的自由从本体论的理由（即从想象力的结构关联）中抽取出来，把马克思的分解论（déliation）与特定的历史环境割裂开来（即从结构关联到一种生产方式的发展）。巴丢的自由既不是本体的属性，也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偶然地、不时地发生的东西。他的自由概念不是我们命中注定的一种状况，而是我们必须努力保持的一种活

[21] 我指的是黑格尔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分析，将其作为抽象决定论的一次实验；我在第13章中论述了这一点。

[22] Jean-Paul Sartre, *La Transcendence de l'ego*, 79/98-99.

动。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重大选择的本体基础将转向真空 (void) 或无 (néant) 的拓扑学或特定情境的概念。

思想只以自身的原理统一为基础，通过清除一切混乱的关系而获得自身的“纯洁” (C, 119)。“在真实的层面上”对类属性加以形式化的每一次尝试都只能依靠自己公设的结果 (LS, 130)。通过这种方式使追随者摆脱一切遗传的联系或契约，真理便作为对本来相关的支持者的分解 (unrelating) 而发生了 (TA, 13.11.96)。巴丢从马拉美那里获得灵感，认为纯洁性可以用作阐释其全部作品的导线：“纯洁是一种理念的构造，它已不再存留于任何关系 [lien] 之中，一个思想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无视一切关系，它孤独的闪光……它的冷淡，它的分离，它的原真性……观念的纯洁所导出的东西，而最重要的是，它所指称的东西，就是与任何事物毫不相关的孤独，每一种律法的无效性，每一种联系和关系的契约的无效性。诗歌(以及其他真理程序)告诉我们存在的状况就是与无建立关系。”^[23]这就是我们的“现代苦行：对思想进行纯粹朴素的分解……：一切都在分解” (D, 123)。这种分解 (déliation) 既是巴丢哲学超凡的雄心，其毫不动摇的决心的基础，也是这种哲学特有的难点之所在——描写真理与知识之间任何可能的关系、主体与客体之间任何辩证关联的难点。巴丢并不寻求改造关系，把压制性关系改造成解放的关系，而寻求从简单关系中删除。只要在这种删除的因素内部发生作用，巴丢的哲学就必定局限于纯粹简单的规定性的空洞领域。

这样一种书在定义上注定要简化复杂的措辞，重新理顺复杂的思绪，在不存在任何连续的地方暗示连续，并普遍展平织物表面上的一些概念皱折，这是巴丢这样一种如此多样的哲学所必不可少的。巴丢第一个站出来警告人们，“那些盲目追随者的令人混淆的忠诚”是危险的。^[24]我希望至少通过偶尔指出上段结尾时暗示的问题而避免一些这样的危险。

如果巴丢著作的兼收并蓄令人无所措手足，那么，应该强调的是，这种混合只不过是任意的或偶然的。巴丢大胆地把自己置于启蒙传统之中：“为了打垮丑恶的迷信，我们总是要诉诸各种科学的坚实而世俗的永恒。” (C, 164) 巴丢始终认为“哲

[23] C, 119–20; cf. Alain Badiou, Rev. of Gilles Deleuze, *Le Pli: Leibniz et le baroque*, p. 182.

[24] Alain Badiou, “Les Langues de Wittgenstein,” p. 2.

学的一贯使命是显而易见的，是其本质的组成部分”^[25]。“哲学始终是系统的”^[26]，因为，如我们将看到的，哲学的基础最终是建立在严格的公理或无条件的观点之上的。最明显的直接结果就是给予那个最具公理性的学科的特权：这就是数学。巴丢像柏拉图、笛卡儿、莱布尼茨和康德一样，也认为数学是哲学的本质条件——这不是说巴丢和柏拉图一样写出了关于数学的哲学。不懂数学的人不应该再推迟了；巴丢的数学计算并不需要积累什么知识，我自己的解释只是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几点。（然而，不懂现代数学逻辑基础的读者在阅读本书主体之前还是应该读一读书后的附录。）

然而，恰恰是由于高度的系统性，巴丢的著作才很难一下子总结出来。每一个构成因素都只能根据它在整个系统中的位置来确定意义——甚至热衷于复杂体系的德勒兹和瓜塔里也都肯定了巴丢系统的“极端复杂性”^[27]。哲学要求“耐心”，其“概念必须慢慢地掌握”，巴丢说，在“满是岩石的”文本领域里，不能鼓励急于求成的读者，要让他们“逐步学会外来词汇。……由哲学的书写所保护的哲学时代不允许急于求成”。然而，与此同时，巴丢严格坚持哲学表现的单一性，“必须与含混作斗争，在核心或本质清除了每一个偶然的变体，清除了由偶然的论证选择带来的每一种污染之前，必须调整它的结构。”^[28]当然，这种论证本身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而且在继续发展。巴丢的哲学过去一直是而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进程中的工作。完整的巴丢的成熟著作，如《存在与事件》以及最近在众多领域内发表的著作，都必须从评价他著作的部分转变开始，即从早期对历史和党派的强调转向对本体和真理的强调。还必须意识到仍未完成的工作，以及发展趋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资格考虑巴丢的系统著作，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已经付出的代价。

.....

我希望本书的主要格调掺杂着怀疑的敬慕。如书中清楚表明的，我的怀疑关系到巴丢把单一性与特殊性部分划等号的问题——这是他从根本上不相信关系的表现——以及这种做法的后果。但是，已经很明确的是，我认为巴丢的著作是他这一代人中最重要，它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这个特殊的

[25] Badiou, "L'Entretien de Bruxelles," p. 25; cf. CM, p. 22.

[26] Alain Badiou, "Being by Numbers," p. 85.

[27]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p. 143.

[28] Alain Badiou, "On ne passé pas," p. 1, 3.

时代所最急需的哲学家非巴丢莫属。我们生活在极端反动的时代。在我们的时代，经济管理取代了发明性的政治，全球市场是作为社会调节的唯一机制而出现的。在我们的时代，用以替换这个机制的有效选择几乎全部见于文化上特殊的群体或身份的偏执式表现，从德国和法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到以色列和阿尔及利亚竞争的原教旨主义。在当代思想家中，只有巴丢毫不妥协地直面这两种现象，它们是我们所处时代最典型的特点。

（陈永国 译）